

化解问题切忌治标不治本

简 复

有的地方抓党建，不善于系统设计，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使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要认真克服和纠正。

——《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古人总结的只解决表面症状、不探究根本原因的处理方式。这就像手机内存、电脑C盘空间满了、引起卡顿，清理缓存固然有一定作用，但不把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根除，问题就始终存在。

治病救人的道理与社会治理的逻辑相通，将治病救人的思路用在治理国家上，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国语·晋语》中提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也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无论是治病救人还是社会治理，矛盾、难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表象之下往往嵌套一种乃至多种深层诱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本质，是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割裂事物内在联系，把复杂系统性问题简化为单一局部问题，最终只能

临时缓解，矛盾会持续累积，无益于真正化解各类复杂难题。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施策，做到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固根本的务实之功。

超越治标局限。面对群众急难愁盼，突发风险隐患，必须快速出手、及时治标，第一时间化解眼前矛盾。但不应止步于此，须在此过程中掌握表象线索，深挖问题产生的根源，推进源头治理。

突破局部视角。整合各类要素，从整体、长远、全域层面统筹谋划治理举措，精准理顺矛盾传导链条，更好化解各类复杂矛盾。

多做潜绩之功。摒弃只追求短期亮眼成果的浮躁心态，主动深耕基础性、长期性、根源性工

作，以久久为功的定力，持续筑牢事业长远发展的坚实根基。

各地推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反复证明：短期层举措只能维持一时，完善机制体系、补齐基础短板、培育内生动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推动相关治理模式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提前梳理矛盾和风险隐患，主动出台系统性预防举措，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

总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古训，至今持续为我们带来启示。我们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处理好标与本、局部与整体、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深挖问题根源、完善相关机制、夯实发展根基，持续破解各类深层次矛盾，推动各项事业行稳致远。

数字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

李嘉楠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和传播可能。一方面，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资源的存续状态。大量不可再生的文物遗存，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以及散落于民间的口述记忆，均可通过高精度数字化采集与存储手段获得永久性保存。另一方面，数字网络以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彻底打破了传统传播过程中的距离隔阂，使身处任何地理位置的公众均能平等接触高品质文化内容，极大拓展了文化的辐射范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为广泛可及的公共文化产品。

此外，数字交互机制重塑了公众与文化的关系。在数字空间中，公众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接收者，而是通过内容分享、二次创作与互动体验等方式深度介入传承过程。这种参与性传承使文化认同不再停留于抽象的概念认知，而是在实践中转化为真切的情感连接。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媒介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梳理了数字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价值，并深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的实践路径。

运用短视频传播，促成传统技艺的日常触达

运用短视频传播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专业场域、进入公众日常视野的一个有效途径。短视频传播的推进需从内容创作与平台分发两个层面协同展开。内容创作层面，需聚焦文化内容的可视化呈现。长久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依靠师徒口传心授、文字记载等方式进行传播，普通公众不太容易接触到。短视频以视听融合的表现形式，将复杂的文化内容拆解为可感知的视觉片段，让繁复深奥的文化内容变得直观可感。平台分发层面，需构建常态化的内容推送机制，将分散的文化展示转化为持续的内容供给。比如，抖音创作者“山白”专注古法传统手工艺复刻，以全流程纪实形式完整记录器物制作工序。其古法徽墨短视频将采烟、和胶、捶打、晾墨等数十道工序压缩在不足6分钟的影像中，该视

频在全网获得点赞。创作者通过持续发布60余个同类视频，逐步形成稳定的内容产出节奏。这种以完整工艺流程为叙事单元的短视频内容，配合平台持续分发的传播机制，将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转化为公众每日可触达的视觉体验。

构建虚拟教学场景，实现历史文化的情景再现

虚拟教学场景的构建能够有效促进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认知，具体而言，可以从技术、教学两个层面共同推进。技术支撑层面，需打造高度仿真的三维数字空间。一直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多依托文字、静态图片，受众缺少沉浸式体验渠道。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构建可交互的三维环境，使学习者能够以第一人称视角亲历文化场景。技术团队依据学术研究成果与历史文献，精准复原场景尺度、视觉元素，实现文化空间数字化真实还原。教学应用层面，需设计任务导向的沉浸式学习流程。单纯的三维场景展示若缺乏教学引导，就难以实现深度认知。教学流程中需将文化知识嵌入场景中的探索任务，让学习者在完成空间漫游与情境问答等环节中自然获取知识。场景内可设置多线索的叙事路径，不同路径对应不同的知识模块，学习者可依据自身兴趣选择探索顺序。以数字化历史文化沉浸式教学实践为例，敦煌研究院联合腾讯推出的“穹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项目于2023年9月正式上线，该项目依托百年敦煌学研究成果与“数字敦煌”长期积淀的资源优势，融合三维建模、虚拟现实技术，以1:1高精度比例立体复刻莫高窟第285窟，搭建起上亿面高精度保真数字模型。在虚拟空间内，学习者可放大壁画细节，清晰感知壁画笔触肌理与矿物颜料层叠敷色的独特工艺。该项目设置线上知识讲解与线下虚拟现实深度体验两种模式：线下游客佩戴虚拟现实设备可穿越至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与壁画人物实时互动。精确建模的虚拟空间配合任务导向的教学流程，将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场景转化为可步入、可探索的具身认知空间。

组织公众创作活动，激发文化遗产的多元表达

组织公众创作活动旨在打破专业机构主导的单一传承模式，将文化遗产的诠释权与表达权交还公众。实现这一目标，需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搭建低门槛的创作平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较多依赖专业机构单向输出，公众缺乏介入创作的制度通道与技术工具。组织方需开放部分数字资源供公众二次创作，同时提供必要的创作指南与学术参考，确保创作活动在尊重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展开。二是建立展示和激励机制。公众创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体表达层面，更在于多元视角对单一文化叙事的补充。具体而言，组织方可通过线下展览、线上专题或竞赛评奖等方式，将分散的公众创作汇聚为可感知的文化成果，使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创作者从文化遗产的观看者转变为主动的表达者。

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发起的“未来遗产创作者”行动为例。该行动由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主办，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通道，设置绘画、演讲、摄影、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等多种创作形式。组织方为参与者提供遗址现场探访与专家讲解等专业支撑，小小讲解员以创作者身份站上遗址讲台讲述千年变迁，青少年创作者以琉璃塔为原型融入南京元素完成国画创作。目前，该行动已收到作品100余件，投稿者涵盖不同年龄与背景的公众群体，既有艺术团体的青少年学员，也有通过网络自发参与的青年创作者。开放的数字资源配合低门槛的参与机制与多元表达通道，将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遗产从静态符号转化为可被公众重新描绘的创作素材。

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文化遗产突破时空壁垒，走向公众日常生活。基于此，应借助数字技术积极创新文化遗产的传播媒介，优化教学手段、丰富创作活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从静态保存向活态传承的根本转变。

（作者系中共葫芦岛市委党校副教授）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坐落于山东省汶上县南旺镇，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核心水利节点之一，是明代“引汶济运”水利工程的标志性工程，2014年随京杭大运河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背景下，明确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文化定位、破解其功能传承困境、推动其功能重塑，既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汶上县文旅融合发展、激活区域文化活力的重要路径。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核心文化定位

其一，承载古代水利营造智慧的实证载体。南旺分水枢纽始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是工部尚书宋礼采纳汶上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为解决大运河“水脊”通航难题而修建的综合性水利工程。该工程由戴村坝、小汶河、分水口、水柜、闸坝等部分组成，形成了“引汶济运、导泉补源、设柜蓄水、置闸节流”的完整体系，通过鱼嘴设计实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精准分水，科学解决了大运河跨越水脊的世界级难题，保障了明清时期的漕运畅通。

其二，大运河漕运文化的关键枢纽。汶上县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要冲，“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滞，则全河停”的俗语，凸显了汶上在大运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南旺分水枢纽正是这一地位的核心支撑。明清时期，南旺作为南北漕运的咽喉，商船云集、帆影连天，形成了独特的漕运商贸文化、船工文化与民俗文化。枢纽周边的分水龙王庙、白公祠等建筑群，更是成为漕运文化的物质载体。

其三，汶上县地域文化的精神地标。南旺分水枢纽的修建与发展，深度融入了汶上的地域文化基因。白英作为汶上本土水利专家，其“躬身实践、因地制宜”的治水精神，成为汶上人精神品质的重要象征。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与汶上县的宝相寺、孔子宰中都遗迹等文化资源相互呼应，构成了“儒韵佛风、运河遗韵”的地域文化格局。当代，南旺分水枢纽更是当地群众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功能重塑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汶上县围绕南旺分水枢纽开展了一系列保护与开发工作，建成南旺枢纽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施了河道治理、数字化展示等工程，但其功能传承与重塑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首先，遗产保护精细化不足，原生风貌受损。南旺分水枢纽部分遗产点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出现墙体坍塌、石刻风化等问题，未能完全保留原生历史风貌。同时，遗产保护与周边生产生活存在矛盾，部分居民在遗产保护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畜禽养殖等活动，对古河道、古坝体造成一定破坏；加之汶上县地处鲁西南，降水集中，水土流失问题对遗产本体的侵蚀较为明显，进一步加剧了保护压力。此外，数字化保护对水下遗产、隐蔽性遗产的探测与保护力度不够，难以实现遗产的全方位、长效性保护。

其次，功能利用单一，文化价值转化不足。当前南旺分水枢纽的功能多以“参观游览”为主，缺乏沉浸式、体验式文化产品。南旺枢纽博物馆虽通过沙盘、3D演示等形式展示工程原理，但互动性不足，难以让游客深入感受古代水利智慧；遗址公园内的游览路线较为简单，未能充分挖掘漕运文化、治水文化的内涵，导致游客停留时间短、体验感不佳。同时，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力度不够，周边配套的文创产品、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最后，文化融合不够深入，区域联动不足。南旺分水枢纽的文化发展未能与儒家文化等形成有效联动。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与济宁段其他遗产点的联动不足，缺乏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与资源共享。此外，文化传播力度不足，对新媒体平台的运用还不够充分，导致南旺分水枢纽的文化影响力局限于区域内。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功能重塑的实践路径

南旺分水枢纽应坚持“保护优先、传承为核、利用为要”的原则，推动枢纽工程功能重塑，实现遗产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发展。

一是坚持精细化保护，筑牢遗产传承根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文化定位与功能重塑

崔彦彦 刘泰祯

基。一方面，加大对遗产本体的修缮与保护力度，按照“最小干预”原则，对核心遗产点进行精细化修缮，保留原生历史风貌；建立遗产日常巡查机制，严防违法建设、环境污染等行为，划定遗产红线。另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加大数字化保护投入，对遗产本体、水下遗址进行全方位探测与数字化存档。同时，加强对治水技艺、漕运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培育传承人，实现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

二是推动多元化利用，激活文化传播活力。一方面，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通过模拟分水过程、互动式治水实验等形式，让游客直观感受古代水利智慧；打造漕运文化体验区，复原明清时期的漕运码头、商铺、船工居所等场景，推出漕运体验、民俗表演等活动，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与体验感。另一方面，完善周边配套产业，开发具有汶上特色与枢纽文化的文创产品；完善餐饮、住宿、交通等配套设施，打造运河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同时，创新文化传播形式，利用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扩大文化影响力。

三是加强深层次融合，构建协同发展格局。一方面，加强与汶上县儒家文化等的融合，打造“儒贤治水”文化品牌；联动宝相寺、孔子宰中都遗迹等文化资源，实现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另一方面，加强与大运河文化带济宁段其他遗产点的联动，融入济宁“运河之都”文化品牌建设，与河道总督署、微山湖运河遗址等形成协同发展格局；积极参与大运河文化带跨区域合作，提升南旺分水枢纽在全国大运河文化带中的地位。同时，融入汶上县现代水网建设，推动遗产保护与生态修复协同发展。

未来，需持续加大投入、创新思路，让这一“运河水脊”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彰显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作者单位：中共汶上县委党校、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本文系2025年山东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从南旺枢纽到时代脉搏：大运河‘水脊智慧’激活当代创新引擎”（编号：2025XTN099）成果】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并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确立了固本强基、绿色赋能的双重发展导向，也对高职院校涉农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要求。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课程，承载着为乡村建设后备人才筑牢理想信念、涵养价值品格、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使命。当前，部分高职院校涉农专业思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仍面临与火热的生产实践“隔着一层”、与生动的乡土情怀“缺着一环”的困境。因此，探索将“红色基因”的铸魂功能与“绿色发展”的赋能作用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不仅是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的内在需要，更是响应国家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战略，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且具备生态文明素养的“新农人”的必然选择。

历史逻辑：红绿交织的演进脉络

“红”与“绿”的交融并非凭空构想，其脉络深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农村发展的百年壮阔实践。它展现为一条红色基因引领与绿色生态意识在实践中从朴素结合到自觉升华的动态演进轨迹。在奠定基业的革命与建设时期，改天换地的红色豪情与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催生了最初的生态实践。无论是延安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中蕴含的适应自然、利用资源的智慧，还是红旗渠工程中“艰苦奋斗”精神与巧借水势的科学态度相结合，都表明红色信仰的实践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

初步尊重。这一时期，“红”是显性的精神驱动，“绿”是内嵌于生产实践中的朴素法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凸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逐步从社会共识加速上升为发展战略。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全民生态实践，再到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国绿色发展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的观念与制度跃升。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进一步推动红色基因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提质升级。“生态扶贫”模式的成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充分印证了绿色文化内核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绿色发展创造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目标，在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上的统一。

理论逻辑：价值同构的内在统一

“红绿融合”育人模式的深刻性，根源于其背后价值内核与理论底底的深度同构。红色文

高职涉农专业思政课

“红绿融合”育人模式的三重逻辑

丁翠娟 刘 婕

化的价值追求与绿色发展的哲学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指向共同的归宿——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持久进步。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深刻指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其真正自由在于同自然完成“本质的统一”。这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生态文明观提供了根本的哲学基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系统回答了“何以共生”“为谁发展”的时代之问。这一思想体系阐明，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本身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因此，绿色发展理论在本质上，是红色价值谱系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时代延展与具体化。

进一步审视，红色精神的内核与绿色理念的要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然要求发展的成果，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由全体人民共享；“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发展必须尊重客观规律，首要的便是自然规律与生态阈值；集体主义

精神与绿色发展所倡导的代际公平、全球生态共同体理念，更是一脉相承。因此，二者的理论融合，并非机械相加，而是引导学生实现从政治认同、价值塑造到生态素养、科学精神的整体性生成。

实践逻辑：复合育人的路径转化

“红绿融合”模式的最终生命力，在于能否有效回应乡土中国对人才能力的复合型期待，并转化为一套可执行、可评价的教育教学体系。这要求涉农专业思政课必须打破传统范式，实现从内容到方法、从课堂到田野的深刻变革。

乡村振兴是涵盖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方位系统性工程，对人才素养提出了复合型、多元化的全新要求：既要有“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赤诚情怀与扎根韧性，也要有推动生态循环、运营智慧农业、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扎实技能。

基于此，涉农专业思政课必须坚持教学改革，实现精准化、内涵式转型。在教学内容重构层面，立足涉农专业特色，开发具有鲜明“农”字

号特色的融合课程模块。比如，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开设“中国共产党‘三农’政策的绿色转向”专题。在方法革命上，必须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构建“田间课堂”。可组织学生深入红色美丽乡村、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围绕“乡村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活态利用”“低碳乡村社区建设方案设计”等真实项目，开展调研、策划与实践。在此过程中，学生不是被动的听众，而是积极的参与者、问题的解决者，从而实现价值体认、知识内化与能力锻造的同步完成。最终培育出一批批心怀“国之大者”、厚植“三农”情怀、掌握绿色农业技术、兼具责任担当与专业本领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农人，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绿色现代化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构建高职涉农专业思政课“红绿融合”育人模式，是一次基于历史纵深总结、理论内在统一与实践迫切需求的系统性探索。它要求教育者不仅做理论的阐释者，更要做实践的引领者，带领学生在历史的回望中校准方向，在价值的融通中坚定信仰，在乡土的实践中增长才干。

【丁翠娟系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院长，刘婕系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马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系重庆市思政课教师探索资助项目“高职院校涉农专业思政课‘红绿融合式’教学模式研究”（编号：szkzy2024013）、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职业教育涉农专业赋能乡村产业人才振兴长效机制研究”（编号：23XJ A880002）阶段性成果】